

秦

· 2015年卷 ·

和

秦

历史文化研究

主编 丁德科

副主编

凌朝栋 党旺旺
蔡静波 韩艳秋

西北大学出版社

渭南师范学院 2014 年校级特色学科建设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4TSXK001

秦东历史文化研究

(2015 年卷)

主 编 丁德科
副 主 编 凌朝栋 党旺旺 蔡静波 韩艳秋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东历史文化研究. 2015 年卷 / 丁德科主编.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604-3814-6

I. ①秦… II. ①丁… III. ①文化史—研究—陕西省
IV. ①K294.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7170 号

秦东历史文化研究 (2015 年卷)

主 编: 丁德科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 编: 710069

电 话: 029-883025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西安华新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39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3814-6

定 价: 38.00 元

《秦东历史文化研究》(2015 年卷)编委会

顾 问 张岂之

主 编 丁德科

副 主 编 凌朝栋 党旺旺 蔡静波 韩艳秋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德科 马雅琴 王双喜 王有景 韦爱萍

叶 玲 田晓荣 刘树友 李明敏 赵伏友

赵 琦 党旺旺 凌朝栋 梁建邦 程书强

韩艳秋 詹歆睿 蔡静波

目 录

◆ 人 物 研 究

“忧同屈正则 事类申包胥”

——记著名爱国人士屈武 刘树友(1)

钟情教育的杨虎城将军 王奎群(7)

“白鹤吊孝”与杨震政治理想论析 孙慧玲(13)

蒲城硬汉,抗战英烈:包森 赵兴牛(17)

唐人姜师度水利成就述评 杨 敏(24)

清官是怎样炼成的

——以“布衣宰相”阎敬铭为例 党旺旺(28)

◆ 方 言 研 究

“华山”之“华”读音浅议 姚亦登(32)

潼关方言本字考 孙立新 姚亦登(34)

从仓颉造字说到汉语与思维之关系 白光霁(41)

◆ 民 俗 研 究

澄城刺绣探究 黄小静(45)

关中丧葬礼俗研究 张静莉(48)

◆ 戏 曲 研 究

李芳桂剧作中的角色命名与渭南方言 田晓荣(51)

陕西东府皮影的现状与思考 蔡静波(55)

◆ 作家研究

生命的感伤与超越

- 白居易在渭南的诗歌主题之一 陈西洁(58)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 论《一路格桑花》的藏地军魂书写 李险峰(62)

- 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的文化创意及价值体现 马俊(66)

俯仰之间尽显本色

- 读李康美散文 任葆华(70)

- 题材广博、内容丰富的苏轼诗 王晓红(73)

还原历史真相,铸写英雄丰碑

- 李么傻《十万男儿血——中条山保卫战》读后 严安政(76)

不奇的奇树

- 解读李康美的《两棵奇树》 张春胜(81)

- 赵熙的文学创作述略 朱正平(85)

- 《爱在何方》与路遥小说的比较阅读 詹歆睿(89)

白居易闲适诗研究

- 从养生学的视角 潘涛(94)

出走与困守

- 李康美《孤堡村往事》赏析 陈理慧(97)

◆ 地方史研究

- 秦东远古战争神话与传说 白赵峰(100)

- 《蒲城县志》修纂、版本源流 程天芹(103)

- 秦东高校新闻教育应加强人文素质培养 梁利伟(113)

- 日本学者编撰《史记钞》选本综论 凌朝栋(116)

- 唐代弘农杨氏宰相群体仕途考论 马建红(120)

- 论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原动力 马雅琴(127)

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大学管理法治化

- 以秦东地方高校为例 乔晓琼(131)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发现及其价值分析(二)

——以渭南地区为例	任忠英(134)
秦东史前文物考古中的文明起源信息	杜振虎(141)
从《史记·管晏列传》中的管仲看太史公的君子观	师 帅(147)
论司马迁对韩非思想渊源的判断	韩艳秋(152)
浅析《史记》中的“爱奇”记叙	张瑞芳(156)
《史记》中的战国四公子	赵小鹏(161)
《史记》之《淮阴侯列传》注释商榷	朱成华(165)
试析《报任安书》中的怨愤之情	徐颖瑛(169)
试论《李斯列传》的叙事方法	凌璐丝(177)
浅论司马迁“史圣文化”在秦东旅游开发中的品牌化与产品化	张 虹(181)
谈楚汉战争的结构手段	王麦巧(187)
惨烈的厮杀,不屈的精神	
——兼谈抗战中的蒲城人	仝梅菊(192)
浅谈秦东地域文化资源对平面广告设计的影响	王波伟(198)
中国传统家族组织的知识图景	
——以秦东地区农村传统家族为例	徐军义(202)
秦东地区本科院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建设的思考	
——以渭南师范学院为例	延 慧(211)
渭南早期农业发展概述	叶 玲(215)
陕西早期共产党人与陕西《国民日报》始末	张始峰(218)
王维桢地域意识在其文论思想中的反映	李 波(221)
明代政府对火葬的治理及其特点	张田生(227)
基督教传播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鲍秋媛(231)
法律中的“和谐精神”在秦东法治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张俊娜(235)
浅谈旅游开发视角下的地方文化资源	
——以富平县为例	赵晓娟(238)
秦东地区法律合作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张钧涛(241)
试论唐代文学的骊山动植物生态书写	李 娜(244)

人物研究

“忧同屈正则 事类申包胥”

——记著名爱国人士屈武

刘树友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摘要:屈武,陕西渭南市临渭区下吉镇人。现代杰出政治活动家,著名爱国人士。在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途中,屈武经历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各个不同阶段,经受了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完成了从一位赤诚的爱国主义者向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完美转身;在长达七十多年跌宕起伏、充满传奇的革命生涯中,屈武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建设,屡建殊勋,赢得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其中尤以“血溅总统府”请求大总统徐世昌电告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有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和约上签字、协助张治中将军护送被关押在迪化的百余名共产党员返回延安、积极促成新疆和平解放、致力祖国统一等举动和业绩而永载史册。

关键词:屈武;“血溅总统府”;新疆和平解放;祖国和平统一

作者简介:刘树友(1963—),男,汉族,陕西蒲城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唐宋史、地方文化研究。

屈武,字经文,陕西渭南市临渭区下吉镇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1992年在北京病逝。现代杰出政治活动家,著名爱国人士。在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途中,屈武经历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各个不同阶段,经受了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完成了从一位赤诚的爱国主义者向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完美转身。

一、跌宕起伏、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

屈武幼年不幸,四岁时父母相继亡故,由年迈刚强的祖母抚养屈武姐弟三人成人。幸得舅父郭辅堂的鼎力资助,屈武6岁入私塾读书,9岁入下邽镇(今临渭区下吉镇)景贤高等小学堂学习。因聪颖好学,深得老师喜爱。

屈武舅父郭辅堂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榜进士,思想开明,为人仗义,曾任河北易县知事,对屈武寄予厚望,但不幸于1908年英年早逝,年仅41

岁。失去了舅父的大力支持,祖母根本无力供养屈武继续读书,只好让年仅10岁的屈武辍学回家,到下邽镇上一家杂货铺当学徒。直到1914年2月,胸怀大志的屈武徒步200余里,赶往华山书院求学。华山书院是由当时号称辛亥革命“关中三杰”的郭希仁、刘嵩如、曹印侯创办。屈武跪求郭希仁收留他,郭希仁为眼前这位好学上进而富有血性的青年的一腔赤诚所打动,答应资助他完成学业。在华山书院求学期间,屈武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勉,注重磨炼意志,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迅速成熟起来。他还给自己取别号“经文”,与名字连在一起,即是“经文纬武”之意。

1917年,屈武考入西安成德中学。“五四”运动爆发后,在西安成德中学读书的屈武闻讯后激动不已,积极动员和组织西安学生举行各种爱国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随

后赴京请愿,面见大总统徐世昌,请求徐电告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有损中国国家利益的和约上签字,激愤之余,竟“以头撞壁,血流如注”,迫使徐最终答应。

7月上旬,屈武和李伍亭在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的资助下,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期间经于右任介绍,屈武晋见了孙中山,面聆教诲,更加坚定了投身民主革命的决心。返回西安后,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在屈武等人的努力下,全陕学生联合会于9月6日重新组建,屈武出任会长。

由于西安各校教员薪金被长期拖欠,生活无着,于是酝酿罢教斗争。刚成立不久的省学联决定积极配合教员的索薪斗争。10月6日,在屈武的组织、倡导下,学生列队来到省政府请愿,要求尽快补发拖欠教员的薪金,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省长刘镇华拒见学生,还令军警阻拦。义愤填膺的学生砸烂了省长衙门大堂的全部桌椅器物。事发后,刘镇华要求陕西督军陈树藩严惩带头请愿的成德中学学生和省学联负责人屈武。

10月8日,陈树藩亲自出马,带领马弁百余名包围了成德中学,威逼学生承认错误。以屈武为代表的学生骨干毫不示弱,据理驳斥。陈树藩气急败坏,竟下令毒打带头的学生,并扣押屈武等人。10月22日,《民国日报》以《陕学生驳斥陈树藩——屈武君真威武所不能屈》为题,报道了陈树藩与屈武的对辩经过,并对屈武备加赞扬,称他“在陈氏淫威之下,竟批陈之逆鳞,而披露其义胆忠肝。屈武君乎,真威武不能屈也”。后来,在胡景翼将军的帮助下,屈武等人逃离西安,前往三原,受到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的欢迎。此间,屈武同于右任长女于秀芝订婚,并于1922年4月在北京结为伉俪。欣喜之余,于右任特意赋诗赞许屈武并书赠爱女:

汝婿亦奇士,青年多美誉。
恍同屈正则,事类申包胥。
至理无贫贱,浮云有卷舒。
进修齐努力,嘉耦复谁知。

诗中把屈武比作我国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和楚国爱国主义士著名大夫申包胥,表达了于右任对佳婿屈武的喜爱和期许。

1920年,屈武考入南开中学。在校期间,他同在津陕籍学生创办《贡献》杂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提倡新教育、改造社会。1922年夏,屈武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经李子洲、刘天章介绍,加入进步组织共进社,任常务主席。在李大钊的教育和帮助下,屈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23年春,经刘天章、魏野畴介绍,屈武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年初,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不久,北京建立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由李大钊亲自领导,屈武为核心成员。10月,屈武参加了冯玉祥、胡景翼等发动的推翻直系军阀曹锟、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的北京政变,并表现出了卓越的才干。11月,受李大钊指派,屈武作为参议随胡景翼国民军第二军驻扎河南。12月,抱病北上至天津的孙中山,提出约见屈武。屈武赶往天津拜见孙中山,孙中山要屈武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赴陕西宣传国民党“一大”精神、召开国民会议以及和平解决南北统一问题等政治主张,争取陕西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回到北京后,屈武向于右任说明了孙中山让他回陕宣传其政治主张的想法。于右任考虑到陕西正处在军阀刘镇华的统治下,干戈不止,战乱频仍,社会秩序混乱,深恐屈武暗遭不测,劝他缓些时间再去。血气方刚的屈武此时已完全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毅然留下一张“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纸条,就与同行的董汝诚离京回陕。

屈武、董汝诚回陕后,四处奔走,大力宣传孙中山的政治主张。1925年2月1日,他们应邀出席陕西省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屈武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国民会议责任在解决国是而树立民众自决之基础”,驳斥了“国人能力弱,会开不成和国民党操纵”的论调。接着,屈武又亲自到陕西各地巡回宣传。两

月后,屈武等回到北京,向孙中山复命。这时孙中山已经病重,卧床不起。屈武同于右任一起探望孙中山并向其简略汇报了陕西之行的有关情况。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屈武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屈武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邓小平、乌兰夫、蒋经国等同学,毕业后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旅苏12年,屈武在政治、感情等方面备受坎坷与磨难。1938年,阔别祖国12年的屈武回国,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顾问处处长、立法委员、少将参议、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陕西省建设厅厅长等职,以各种方式效力抗战。1939年初,屈武结识了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内外政策都发生了右倾变化,国内时局开始逆转。周恩来经常与屈武探讨时局问题,使屈武认清了政治上的是非,认识到抗战胜败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坚持到底;而能不能坚持到底,就在于国共两党能不能保持团结合作。这一认识,成为屈武当时和以后的政治倾向和行动指南。周恩来还通过屈武努力做好于右任的工作,对屈武说:“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方面爱护他。要让他国共两党团结抗战问题上保持坚定的立场;对这方面发生的重大问题,要有正确的立场和积极的态度。”屈武非常体念周恩来珍视国共合作的苦心,此后,他在于右任身边生活了近6年,帮助于右任工作。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屈武为维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皖南事变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屈武和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等在重庆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他们团结国民党左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国统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5年秋,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接见了屈武、王昆仑等人,对他们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们是“抗战功臣,无名英雄”。

蒋介石对屈武在重庆的激进、“通共”言行,极

为不满,便于1944年春令屈武去陕西担任建设厅厅长。屈武割舍不下重庆的工作,不愿从命,招致蒋介石雷霆大怒。屈武请示周恩来何去何从,周恩来认真考虑后说:“违抗是无益的。你到西安以后要经常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同志联系。”1944年春,屈武离开重庆,前往陕西赴任。

同年秋,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简称“三区”)广大农牧民不堪忍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阿合买提江等人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蒋介石派出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中央和平代表团,赴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市)解决新疆问题。经反复遴选,张治中将屈武列为代表团成员之一。和平谈判期间,熟悉苏联事务的屈武在联络并取得苏联驻新疆总领事的调停、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6年夏,屈武协助张治中将军通过和平谈判,同“三区”革命力量达成了协议,成立了以张治中为主席、阿合买提江为副主席的新疆民族联合政府,屈武任委员并兼任迪化市市长,使新疆形势得以稳定,为以后新疆和平解放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风雨飘摇,岌岌可危。蒋介石被迫下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实现和平的声浪中,代总统李宗仁表示愿意在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派出以张治中将军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代表团赴北平与中共和谈。屈武作为代表团的顾问,随团前行。代表团来北平前,张治中与屈武两次去奉化溪口,分别会晤蒋介石和蒋经国,就和平问题进行请示。通过会晤,屈武基本摸清了蒋氏父子对和谈的意图,就是以和谈作为缓兵之计,伺机反攻,反攻不成就搞划江而治,决不接受惩办战犯、改编军队等条件。屈武回到南京后,将蒋氏父子对和谈的态度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吴克坚及时报告给中共中央。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后,屈武取道上海回到迪化,全力投入到促成新疆和平解放的工作中去。

1950年初,屈武调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副主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同年,经李克农、徐冰介绍,屈武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文革”期间,屈武惨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揪斗、辱骂、毒打、威逼利诱,不一而足。屈武始终没有在邪恶势力面前低头。最后被以“反革命”罪逮捕,于1968年关入北京秦城监狱达6年之久。

粉碎“四人帮”后,屈武参加民革中央工作,先后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代主席、主席兼中共党组书记。此后,他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开拓新时期民革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

晚年的屈武,心系祖国统一大业,利用他的广泛社会影响和社会关系,在海峡两岸穿针引线,为祖国统一尽心尽力。

二、不寻常的举动和业绩

在长达七十多年跌宕起伏、充满传奇的革命生涯中,屈武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建设,屡建殊勋,赢得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其中尤以如下数桩举动和业绩而永载史册。

1. “血溅总统府”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在西安成德中学读书的屈武闻讯十分激动,在校内广泛宣传北京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积极参与和组织西安学生的爱国运动。6月初,在屈武等人的筹划下,陕西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屈武当选为会长。6月26日,屈武抵达北京,在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李子洲、刘天章的陪同下,会见了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许德珩等人。6月27日下午2时,包括陕西学生联合会代表请愿团在内的全国7个团体、500多名代表聚集新华门,公推屈武等10人作为代表,求见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要求政府下令给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有损中国国家利益的和约上签字。徐世昌派教育部次长、警察署长等出面应付,自己并未露面。代表们则坚决要求面见徐世昌,当晚在新华门外通宵静坐。28日,徐世昌迫于压力亲自接见请愿代表。屈武基于爱国义愤,声泪俱下,慷慨陈词:

“现在国家都快要亡了,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后天就可能丢掉整个华北。如果政府再不想办法,不答应学生的要求,我们只好以死力争!”说罢便长跪痛哭,声震屋瓦,然后“以头撞壁,血流如注”。当即被送往医院救治。次日,北京出版的《公言报》即予以宣传报道。屈武“血溅总统府”的爱国壮举迅即传遍大江南北,被誉为“爱国英雄”,名扬天下。经过斗争,终于迫使徐世昌明确电告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后来于右任诗赞屈武“忧同屈正则,事类申包胥”,即指此事。

2. 协助张治中将军护送被关押在迪化的百余名共产党员返回延安

1944秋,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简称“三区”)广大农牧民不堪忍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阿合买提江等人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经过一年斗争,到1945年秋,这里的国民党军队大部被歼灭,余部撤至玛纳斯河东岸,双方形成对峙局面。此时,抗战刚取得胜利,国共两党正在重庆举行谈判,蒋介石为了稳定局势,安定人心,立即组成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中央和平代表团,赴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市)解决新疆问题。经反复遴选,张治中将屈武列为代表团成员之一。屈武向周恩来汇报了此事。周恩来说:“如果蒋介石同意你到新疆去,那是一件好事。第一,可以摆脱胡宗南和祝绍周的魔掌。第二,张文白(张治中字)在国民党上层不是顽固派,在政治上是向前看的。同他一道工作,可以帮助他不断进步,对将来处理国共之间的问题,是会起好作用的。”并在屈武临行前一再交代:“你到新疆去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办: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关押了百余名共产党员,到现在还没有释放出来。我已经向文白先生提出,请他到新疆后,贯彻《双十协定》中释放政治犯的条款,把这些中共党员予以释放并送回延安,文白已经表示同意。不过,他到新疆是从事和平谈判解决‘三区’问题的,一定很忙,很容易把这件事置之脑后淡忘下来,你必须随时提醒他,并协助处理好这一重大问题。”

1945年11月,国民党赴新疆的中央和平代表团一行十人飞抵迪化市。屈武在积极协助张治中与各方协商谈判的同时,又大力协助、配合张治中营救、释放并护送被新疆国民党地方当局关押的百余名共产党员回延安一事。屈武多次奉张治中之命探视监狱,改善被关押者的生活条件。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经过张治中和屈武的巧妙斡旋和不懈努力,1946年初,蒋介石终于同意释放这批被关押4年之久的中共党员。为了使他们能安全返回延安,张治中和屈武对所需经费、车辆、药物、医生、警卫、通讯工具等都做了精心周到的安排,还特意通过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选派得力人员随行护送,陶峙岳特地将此项任务交由新疆警备司令部交通处办事干练的少将处长刘亚哲完成。1946年6月6日,被关押的老小131人从迪化出发,经过一个多月、长达3000多公里的艰苦跋涉,克服重重困难,于7月9日安全、顺利抵达延安。这些人当中,包括马明方(建国后曾任陕西省委书记等职)、方志纯(建国后曾任江西省委书记等职)、高登榜(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杨之华(瞿秋白烈士夫人)、朱丹华(毛泽民烈士夫人)等人。^{[1]129-139}圆满完成了周恩来交办的这项重大任务。1949年4月,当屈武以国民党和谈代表顾问身份飞抵北平时,周恩来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协助文白先生完成这项最重要的任务”。

3. 积极促成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4月,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后,屈武取道上海回到迪化,全力投入促成新疆和平解放的工作。早在1948年5月,暂居兰州市榆中县兴隆山的张治中将军,就电约新疆方面的屈武、刘孟纯、刘泽荣来兴隆山秘密开会,研究日后新疆“和平交代(即和平起义)”事宜。屈武等人随即回新疆“分头做准备工作”。^{[1]144}在全国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新疆方面中共人士的得力工作和中共政策的感召、以及张治中将军去电劝告等多重有利因素的作用下,屈武等人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1949年9月25日,西北军

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司令的陶峙岳将军顺应时势,率部通电起义。次日,包尔汉、屈武、刘孟纯等省政府委员发表通电,将旧政权改组为新疆临时人民政府,听候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

接着,屈武受陶峙岳将军指派,任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入疆代表团团长,前往甘肃酒泉,代表新疆起义部队、新疆临时人民政府和新疆各族人民迎接解放军进疆。至此,新疆和平解放圆满实现。屈武历经艰辛,终于胜利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又一项光荣使命。

新疆和平解放后,屈武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屈武为稳定新疆社会秩序,推行民主改革,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改善民生,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1950年初,屈武被调往北京工作。3月,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屈武,并对他说:“新疆起义的意义很大,我们知道你在其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4. 致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1979年1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特别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标志着两岸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对“一国两制”构想,屈武表示衷心拥护,认为这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唯一正确途径,希望台湾国民党当局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举行两党对等商谈,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此他于1980、1981年两次致电与他有同窗之谊、交情甚深的台湾领导人蒋经国,晓以民族大义,呼吁蒋经国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几十年来,屈武矢志致力于国家统一,就祖国统一问题发表了许多谈话、讲话和文章,并通过在台湾和海外的广泛社会关系,积极开展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甚至在他病重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遗嘱亲人:海峡两岸人民团圆那天,你们为我斟上一杯茅台酒,让我在九泉之下分享祖国统一的欢乐。^{[2]54-61}

总之,屈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的一生,是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的一生。他那坚强的革命意志,鲜明的原则立场,刚正不阿的性格,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学习。

参考文献

- [1]余湛邦.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2]刘树友,吴玉玲.渭南历史文化丛书·风云人物(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

钟情教育的杨虎城将军

王奎群

(渭南师范学院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摘要:杨虎城将军非常重视教育。他重视教育与其出身、成长奋斗经历密切相关,尤其是东渡日本考察,他认识到教育对革命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他创办了一系列军事教育机构。主政陕西后,他继续创办学校,并设法保障教育经费,改革教育内容,提高教师待遇,资助优秀青年,使陕西的教育事业出现了生机。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他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培养成德达才的人才、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学术思想自由等教育思想。

关键词:杨虎城;陕西教育;教育思想

作者简介:王奎群(1970—),男,河南新乡人,硕士。渭南师范学院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陕西革命人物及中国教育史研究。

杨虎城将军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1936年12月,他与张学良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被周恩来总理誉为“千古功臣”。其实,他不仅是位爱国将领,而且在戎马生涯中对教育非常重视,尤其1930年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对陕西的教育事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陕西的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杨虎城为什么对教育如此重视?他的教育实践有哪些?在教育实践中形成了怎样的教育思想?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杨虎城重视教育的原因

杨虎城将军常年带兵打仗,却对教育非常重视,是有特定原因的。

1. 农民出身的影响

杨虎城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只读过两年私塾,文化程度很低。早年投入革命,他只知反清抗暴,劫富济贫。后来他逐步认识到文化程度低给他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1922年,靖国军失败后,杨虎城率部蛰居陕北,此时的他对前途感到茫然,正是由于结交了魏野畴、

杜斌丞等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才解决了他的困惑。杨虎城总结自己“参加中国国民革命,奋斗十余年,累受挫折,牢骚出国就是因为方向不明”。^{[1]26}他曾感叹道:真正有本事的人,就是那些善于读书的人!杨虎城认为获得知识有通过实践和课堂学习两种方式:通过实践获得知识要遭受很多曲折,碰许多钉子,乃至流血牺牲;通过课堂学习既轻松快捷,又不会流血牺牲。他说自己当时由于家庭条件限制,只能走第一条路。为了不让像自己一样出身贫苦的青少年从小失学,他曾立下宏愿:自己奋斗成功后,要为社会多办学校,让更多的青少年接受正规教育,从而为社会培养更多有用人才。

2. 出生地域的影响

杨虎城出生于陕西蒲城,这里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曾涌现出清代名相王鼎、辛亥革命元老井勿幕等叱咤风云的人物。杨虎城虽然读书不多,但同乡前辈王鼎、井勿幕对他影响很大。王鼎做过幼年道光帝的老师。一次,道光贪玩没有完成作业,王鼎便责罚他下跪。正巧嘉庆帝路过太子学馆,看到心爱的皇太子跪在那里,十分恼火,拉起

道光,怒视着王鼎说:“读书,将来是皇帝;不读书,将来仍是皇帝。”王鼎临危不惧,从容地答道:“圣上有所不明,读书,则可为尧舜;不读书,将为桀纣。”嘉庆一听,猛然醒悟,让道光规规矩矩地跪在原地。这个故事让杨虎城从小就知道读书学习很重要。杨虎城曾说他的革命,实由于“蒲案”起始。1908年10月,发生在蒲城县“蒲案”,正是由井勿幕领导的陕西同盟会革命党人直接领导的。“蒲案”的发生极大地震动了杨虎城,他非常佩服青年学生的勇敢斗争精神,对陕西同盟会领导人井勿幕更是由衷崇拜。

3. 东渡日本的经历

皖北暴动的失败加上身体不适等原因,1928年4月,杨虎城前往日本考察,他说:“喊了多年打倒帝国主义,今日要到帝国主义国家去,借此机会,一定要好好地弄清帝国主义的内容,方不负此行。”^{[2]48-49}在日本期间,杨虎城每天除了读各种报纸刊物,还经常到处参观游览,以增加对日本社会的感性认识。他在日本虽然只住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对他此后的政治军事生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一次,他在日本参加礼佛盛典,日本国民高度的自觉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虎城主政陕西后,在西安中小学教职员欢迎会上他说:“那盛会上参加的人至七十余万之多,若在中国,因拥挤的缘故,必然发生危险。这都是小学教师之力,我们可极应效法的。”^{[1]26}他还说:“日本小学教育较为完善。日俄之战的战胜,都归功于日本的小学教师。吾人对此,初尚怀疑,及到帝国大学里边一看,方知确系实情。因为无完善的小学教育,就练不好智勇兼备的军队。”^{[1]26}

4. 孙中山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是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杨虎城一生都景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和人格风范,一生都在用行动实践着自己“坚决跟着孙中山走”的誓言,努力实践着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一位坚定的三民主义信徒。^{[3]5}孙中山很重视教育,曾亲自创办学校,为学生讲课。他认为革命需要教育,用三民主义的理论教育人民

才能唤起民众,增进他们的政治觉悟,这是革命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他还认为个人的成长、成才需要教育。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指出:“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学而后知,人不能皆好学,必等教而后学,故作之君,作之师,所以教养之也。”^{[4]8-9}孙中山在其理想的三民主义共和国蓝图中,主张每个人都应该终身接受教育,通过教育学会管理国家的本领,成为国家的主人翁。

二、杨虎城的教育实践

在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之后,杨虎城将军一直为振兴陕西的教育事业而尽力。

1. 创办各类学校

杨虎城是一名将军,为提高部队素质,培训骨干力量,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创办了一系列的军事教育机构。1924年初,他在安边成立了教导队,邀请赵寿山和保定军校毕业生刘光甫、段象武等到安边任教。1925年,杨虎城在耀县文庙成立了“三民军官学校”,自己兼任校长。学校仿照黄埔军校建制,校内分为教授、教练、政治、军需、管理、军医六大部。“九一八”事变后,杨虎城又创办了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自己兼任班主任。正是由于他非常重视提高部队素质,才使他这支队伍从辛亥革命后陕西邻里的各部队中脱颖而出,成为西北地区举足轻重的势力。

除了创办军事教育机构,杨虎城在繁忙的军政之余,对普通教育事业也非常重视。从1922年蛰居陕北到西安事变后被迫出国的十多年期间,有学者做过统计,杨虎城先后创办了九所小学,两所中学,争取创办了一所大学。^{[5]195}这样的成绩在当时军阀混战、普遍不重视教育的中国,在一切处于落后状态的陕西,是异常惊人的。

早在陕北驻防时,杨虎城就把整顿盐税得来的收入,除补助军费外,在三边地方设中小学。主政陕西后,他更加重视办学。由于陕西当时尚无一所正式的高等院校,他就多次要求南京政府在西北建立一所大学,在于右任、焦易堂等陕籍国民党元老支持下,终于在武功县张家岗创办了当时西北地区的第一所高等学校——西北农林专科学校

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前身)。西安城西北角是回民的聚居区,回民曾多次请求政府建立完全小学,却屡遭挫折。杨虎城入陕后,回民又提出要求,他立即责成教育部门办理。为办学,他不惜压缩军费开支。临潼县西北的阎良镇因地处偏僻,学生上学不便,失学者甚多。1935年,当地名士朱先生请求将军资扶办学,他当时虽已被免去省府主席之职,但想到办学,慨然应允,从军费中拨出一千元助建阎良小学。为办学,他曾个人多次捐款。1932年8月10日,他为私立长安景龙小学捐洋100元。^{[6]285}1934年,他自己出钱并募捐在家乡蒲城创办尧山中学。为提高教学质量,1935年又在尧山中学修建起一座图书馆,设施之先进和藏书之多,在当时全省各中等学校中是一流的。在创办尧山中学的前后,他还在蒲城创办了尧山、孙镇等几所小学。他还计划办一所乡村师范学校和一所农业学校,后由于1937年6月被迫出国,这个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2. 保障教育经费

教育离不开资金。教育经费有无保障,关系到教育事业能否稳定和发展,作为省政府主席的杨虎城对此非常清楚。1930年12月8日,杨虎城出席泾阳县在郊外举行的各界欢迎大会上讲到:“陕西过去教育落后的原因,固然是交通不便,而主要者,是经费常被挪用,教育费无着,所以出现停顿与衰退之状。兄弟今后把教育费令其完全独立,一切当积极计划,使教育费不但独立,且要陆续增加,使教育能日行发展。”^{[6]163}

为增加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杨虎城在1930年12月26日公布的《政见商榷书》写到:“将商税、棉花税、卷烟特税全数拨归教育厅,保障独立。无论何人,或借口何事,均不得提用分文,以重学款,而宏造就。”^{[6]153}1931年3月3日,杨虎城在全省教育局长会议开幕典礼上讲话时再次强调:“现在新政府成立,各项行政固然要积极进行,对于教育方面,更要急切整顿。以前教育经费,虽有棉捐杂税,但为数不多。目前宁可把军队解散,教育经费是不可不充分筹备的。”^{[6]195}杨虎城说到

做到,他果真从所部军费中拨出一笔专款,充作教育基金,由教育界进步人士组成陕西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保证专款专用。

杨虎城认为用人不当,经费再多,也是等于无效。假使有一人能为社会所信仰,若办教育,经费就自不成问题了。^{[6]198}为此,他在筹组省政府时,打算聘请进步人士李百龄为教育厅长。蒋介石为了控制杨虎城,没有批准,而是派李范一来陕西任教育厅长。省府秘书长南汉宸在杨虎城的赞同下,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学生开展“倒李运动”,最终把李范一轰走了,坚持任用李百龄为教育厅长。李百龄积极支持杨虎城的工作,不惜压缩军政开支,坚决保证教育经费如数拨给,概不拖欠。同时,杨虎城果断地撤换了一批旧校长,委任一批进步人士为新校长。

3. 改革教育内容

蒋介石为了扼杀青年的革命思想,在全国推行了一整套法西斯奴化教育,杨虎城对此深恶痛绝。他坚决反对蒋介石在学校安插党羽、广布特务、压制和强迫学生接受奴化教育的做法。他提出“你办你的教育,我办我的教育”^{[2]89}。针对蒋介石的反动教育方针,他提倡学术思想自由和抗日爱国教育。

为贯彻民主爱国的进步教育方针,杨虎城整顿调整了教育界的人事。首先,他把一些思想保守的校长和教育界的人士逐步安排到行政部门,任用一些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担任校长。其次,与南汉宸等发动青年学生赶走了教育厅长李范一,任用有志于发展陕西教育的李百龄为教育厅长。第三,召开省政府政务会议,通过修正的《陕西省立中等学校暂行组织规程》《陕西省立中等学校教职员资格任免待遇规程》及《陕两省立高级中学校暂行组织规程》等议案。

杨虎城很赞赏蔡元培先生民主的开明办学方针,主张思想信仰自由,允许学校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读物,让师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紧侵华步伐,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杨虎城特别重视对青年学

生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如杨虎城创办的尧山中学把抗日救国教育贯穿于教学中,教师们经常向学生讲授抗日救国的道理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公开与蒋介石的“侈谈抗日者杀无赦”的政策对抗。为培养能文能武的抗日人才,他专门给尧山中学配发了武器,将抗日爱国教育与军事训练结成一体。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

4. 提高教师待遇

杨虎城主政陕西前,统治陕西的陈树藩、冯玉祥等军阀致力于内战,为了获取更多的军费而削减教育经费,致使教师的工资经常被七折八扣或长期拖欠,有的竟以省财政厅的一纸空文拨到各县,让教师自行前往交涉领取。为了能将空头支票兑现,一些教师只得忍痛将自己的血汗钱与县衙门的官吏们平分。有些人甚至连一分一文也领不到。教职人员收入的低微,以及低微的工资都得不到保障的状况,严重影响了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工作积极性,从而滞碍了陕西教育的发展。

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教师。杨虎城非常重视教师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他曾说:“国民革命之成功,三民主义之实现,全赖各教师领导青年,培养人才。”杨虎城常对部下说:“当国民党的官,难免刮地皮。不过,我想把刮地皮的钱,尽量用来给老百姓办事。”^{[2]86}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除了赈灾、兴修水利外,还大幅度地增加了教师的薪水。西安的中学教师中,月薪较高者可达七八十元,比一般司书人员要高一倍以上,就当时的生活水平说,是比较高的了。这样,辛亥革命后近二十年中教职员生活无法保障的局面有了较大改观,从而解决了他们的生计之忧,提高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5. 资助优秀青年

由于军阀的压迫、摧残,教育的废弛,造成了“陕西的青年,完全无牺牲精神,其有令人痛心者”的局面。杨虎城认为陕西青年缺乏积极向上的风尚,这就是陕西“什么都不长进”“事事落后,事事失败”的根源。为了培养人才,杨虎城在省政府的政务会议上多次讨论在国内各大学读书的陕籍家境较差的学生的资助问题。如1931年11月24日

的省政府第71次政务会议上准给北平师范大学杜缨昌等陕籍学生发给毕业参观费。^{[6]257}1932年4月1日的省政府第91次政务会议上准给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陕籍学生发津贴。^{[6]271}1932年5月6日省政府第93次政务会议上通过国内各大学陕籍学生奖学金规程。^{[6]274}

对一些优秀的学生,杨虎城积极派遣他们到世界先进国家留学。他说:“陕西地当边陲,扼潼关的天险,闭关自守。嗣后吾人应打破地域观念,目光须指向潼关以外,乃至中国以外去探听去接受新的世界潮流。”^{[1]36}他还说陕西文化落后,无论如何,须选派人到外地及国外留学,造就专门知识。他先后挑选王炳南、袁若愚、江隆基、潘自力、原正庭、蒲克敏、亢心裁等人赴日、德、法、英等国留学。有些青年他明知是共产党员,他也选送;有些是素不相识的,但一经友人介绍,只要是人才,他都慷慨解囊,给予资助。为了鼓励留学生,他曾写信说:“我拿‘地皮剩余’,供给你们青年上学,绝没有什么错误。你们拿到‘地皮剩余’,要加倍学习。”^{[2]87}这些人回国后,绝大多数成为革命的中坚或学术界的名流。

三、杨虎城的教育思想

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杨虎城将军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

1.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杨虎城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教育救国,他认为教育能培养救国人才,使国家振兴民族文明。对陕西的贫穷落后,他痛心疾首。他主政陕西后,计划通过创办学校、保障教育经费等措施千方百计振兴陕西教育,改变陕西人才匮乏、文化落后的面貌,使陕西逐渐强盛起来。杨虎城在他创办的学校中,非常重视爱国主义教育。为把尧山中学办成一所进步的爱国的学校,杨虎城苦心孤诣,对校长的人选、教师的聘请、图书的采购等,均一一过问,他还亲自把“教育救国”四字作为该校校训。

在对士兵的教育中,杨虎城的爱国主义思想更为突出。靖国军失败,杨虎城蛰居陕北后,深感所部对国民革命认识不足,决心要加强对部队的